第一章

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军事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便开始了延安时期。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这一时期毛泽东经历了直罗镇战役、瓦窑堡会议、东征、巩固与扩大陕甘苏区、同东北军和西北军建立统战关系，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山城堡战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并著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重要的军事著作。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所以这时期毛泽东的军事实践与理论全部为着“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战略方针的确立

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全国抗战形势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前后，全国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发展。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开始发动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战争。1932 年 1 月，为扩大侵略战争，转移国际视线，压迫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的事实，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三省稳定阵脚后，又将魔爪逐渐伸向华北。1933 年 5 月，日本政府又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实际上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和热河占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4 年 4 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日本政府企图独占中国的声明。为实现这一企图，日军于 1935 年发动了“华北事变”，先后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新的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实际上包括把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送给了日本。继之，日本采取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政治上制造分裂的方法，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实行由它控制的所谓“特殊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1935 年 11 月国民党行政冀东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 月，国民党政府竟答应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使冀察两省变成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日本统治地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并在抗日和内战问题上作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于 1931 年 11 月在对顾维钧就任

外长的训词中，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政策。1932年12月14日他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会议上对这一政策给以更详尽的阐述，他说：“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我们自己不欺侮自己，无论哪一个外国，都不能欺侮我国，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作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①]蒋介石视日本侵略为切肤之痛，视中国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所以必先除心腹之患后治切肤之痛。由于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不顾，对内大肆用兵，先后对江西中央苏区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围剿”，严重削弱了抗日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可乘之机，使得日本侵略军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如果不是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本侵略军绝不会轻而易举地占领整个东北并侵入关内，这一点，连日本侵略者自己也很清楚。当年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如果中国的抗日力量集结起来，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②]

虽然蒋介石一再强调‘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客观上改变不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即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生存的情况下，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外的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

① 《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矛盾也降到次要地位。

在民族危亡到紧急关头，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广大群众的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卖国妥协的斗争更加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蒋介石指使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当学生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受到军警的突然袭击，很多学生受伤或被捕。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并迅速扩展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使中国人民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看到了自身的力量，增强了奋起救亡的信心，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一部分已经出现抗日反蒋的趋向，另一部分也在抗日和卖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这时虽然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他们分别代表英美日等国的利益，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时候，英美派同亲日派之间就加剧了明争暗斗。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以马占山、李杜等人为代表的东北军爱国官兵，违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对入侵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同年 12 月，有中国共产党工作基础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 1.7 万余人，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宣布反蒋，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行列。1933 年 5 月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方振武等在中国共产党员吉鸿昌等的策动下，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任总司令，方为前敌总司令，吉为前敌总指挥，部队迅速发展到 8 万人。1933 年 11 月，曾在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自动率部抵抗过日本进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联合国民党左派李济

深和第三党等，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和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这些事件的发生，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乡村富农和小地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也提供了利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以便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可能。

在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尽管处在国民党蒋介石不断“围剿”的险恶环境下，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战主张，始终站在抗日的前列，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1931 年 9 月 20 日，即“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①]9 月 22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加紧领导和发动群众的反帝运动，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打击日本帝国主义”。[②] 9 月 25 日，毛泽东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名义，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东北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抗日组织和军队进行反侵略的斗争。中共中央迅速派出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赵一曼等去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并组建抗日联军，与自发组织起来抗日的东北义勇军一道，在白山黑水间展开抗日游击战争，从而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9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416—424 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与北上抗日

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了反蒋抗日的决策,即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采取了以国内战争为主，同时积极发动群众，从政治上、军事上做好抗日准备的方针。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决策和方针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由于实行了反蒋抗日的决策，使蒋介石消灭工农红军的狂妄企图未能实现，从而保存了中国抗日的中坚力量。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使全国的抗日力量得以逐渐地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进一步促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这就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把国内战争逐步转变为抗日民族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当然,由于这一阶段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因而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和军事战略指导上也犯有严重错误。这主要表现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因而“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国内阶级关系问题上,否认“九一八”事变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甚至主张以主要力量来打击那些所谓妥协的反革命派。在军事战略上，过分夸大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实行进攻路线，继续推行进攻敌人重兵把守或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或脱离实际地强调红军的正规化和进行所谓的正规战争。由于这些错误，延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进程，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各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或失败。江西中央红军也因此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也由于同这些错误作斗争，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他来之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他用以争取中间势力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土地

革命的原则，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它在军事上灵活运用战略战术，被指责为‘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等。并被撤消了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职务。直到长征途中,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早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如在 1933 年 5 月 28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中就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5 月 30 日,中共中央局发表为《为‘五卅’八周年纪念宣言》,也提出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口号。为实现北上抗日的方针,1934 年 7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抗日。7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此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郑重表示：“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但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还不能完全实现北上抗日的方针，这是因为“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能不首先同进攻我们的百万以上的国民党匪军血战，保持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自由的苏维埃领土。”① 当中央红军要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正确处理长征和抗日的关系，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战争的关系，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把中央红军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和北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347 页。

抗日的进军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红军长征军事战略和进军方向的头等重要问题。

1934 年 11月，正当中央红军还在长征的途中，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为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 2900 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省罗山县出发，开始转移。并于 1935 年 9 月,到达陕西省延川县，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由此可进一步说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的指导下，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势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战略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三、瓦窑堡会议和抗战基本战略方针的确立

1935年 7 月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际 ",大家都应有'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的真诚觉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而提出建立抗日民众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建议组织国防政

府,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全民总动员,武装千百万群众,战胜侵略者。同年 11 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代表团派代表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陕北瓦窑堡，给中共中央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甘边区。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11 月 28 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与朱德联名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议，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在这个宣言中还提出了这个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应有的十大纲领。①

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国全社会的主体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12 月 17 日至 25 日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

毛泽东 12 月 6 日离开东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8 日到王家坪,11 日到安塞,13 日到达瓦窑堡。17 日上午会议开始，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邓发、凯丰、李维汉、张浩、刘少奇、杨尚昆、郭洪涛等 10 余人出席。

会议在讨论问题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的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册,第 580—581 页。

以争取的。秦邦宪引经据典地强调：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在日本侵略造成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是会发生变化的。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他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联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达成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连敌人的营垒都会发生破裂的。当时由于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所以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是卖国贼头子，应该给予打击。但打击蒋介石只是打击他卖国的一面，毛泽东已预见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蒋介石也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关于这次会议开头几天的情况，毛泽东在 12 月 19 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明后天讨论军事问题。’[①]

23 日，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

（一）关于战略方针：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状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及战略方针应当首先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这一军事战略方针是建立在党的抗日反蒋的政治基础上的。首先是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智识出智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到最后一滴血”，并提出“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的口号。这里的国内战争已不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 497 页。

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战争，而是指“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汉奸卖国贼”，“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卖国贼”。而对于任何抗日武装，红军都愿意和他联合起来，“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两个战争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谁是真正的敌手，说明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已经开始了根本性的变化。

为要实现上述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如下战略要点：

1、党在 1936年的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由于红军还没有直接与日本占领区接触，中间还隔着一块国民党统治区，所以 1936 年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 1936 年下半年，红军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在晋绥察方面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

2、“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就要猛烈地扩大红军。毛泽东当时计划 1936 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扩大到 20 万人，红军第一方面军要扩大到 5 万人。毛泽东还提出要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到游击队中去；争取白军加入红军，加入游击队；主张抗日联军，称中华抗日义勇军、中华抗日人民革命军，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蒙、回族等少数民族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总之，抗日行动要放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

3 为坚决而有力的执行上述战略方针，毛泽东还具体提出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目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

4 毛泽东充分肯定除红军第一方面军以外的红军第二、六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团、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斗争，指出他们的斗争对于南京军阀反共反红军的行动的削弱和牵制有极大的战略上的作用。

5 毛泽东还指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提出游击队要有根据地，但必须反对保守主义，要同当地革命民众密切结合起来。提高游击战术，使游击队变为正规的革命军。值得说明的，毛泽东在这里指出的具有战略作用的游击战争，是指中华抗日义勇军或中华抗日游击队或中华抗日人民革命军之类的地方革命武装的作战形式，还不是指正规红军的作战形式。地方革命武装是受地方党，即白区和苏区的党组织指导的,并要‘使游击队变为正规的革命军’。而对于正规红军来说，还是“运动战是基本原则”，这是要在下一个问题中说到的。

（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

对于作战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总结了过去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红军行之有效的一套战略战术原则。

在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一般情况下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这不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宁都会议及其以后批评的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而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

在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把两个以上的苏区打成一片和消灭苏区中间及其附近的白色据点,打土围子,不是 1932 年党报上批评的所谓“机会主义的动摇”，而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在 1932 年反对‘上山主义’及‘东北路线’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谈到一般作战原则的问题时，提出如下一些重要的军事思想：

1战争方式的游击性,既没有固定的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所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就是过去军事指导上的长处。在这里反对所谓的“游击主义”是错误

的。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结果失败了。

2 但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光靠战争方式的游击性是不可能的，要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使没有固定战线的状态，改变为一般有固定战线的状态。游击战要向运动战发展，所以对于改变红军技术条件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3、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的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4 主张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两个拳头主义，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击溃战。

5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

6 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

7 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8 据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

9 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连结到明天，把小的连结到大的，把局部连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10、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上述一般军事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完全适应在全国抗战前夕红军作战的实际情况，特别是重视游击战的思想，战略的持久战的思想很有预见性，对于进一步确定全国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三）关于行动方针：

主要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作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如在北面组织红军第二十八军、南面组织第二十九军；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一个打击 赤化宜川、洛川两县 扩大新兵 5000 人，扩大游击

队到原有数的二分之一等等。

第二步,到山西去(东征),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 15000 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所需的渡河船只等物质条件。

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的进攻情况，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是否打绥远，估计有困难。要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关于当前红军的军事行动方针，毛泽东强调，就是要在 40 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

与会者基本赞成毛泽东的军事问题的报告，但也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如周恩来提出：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

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又作了结论。他说:讨论中大家补充了我报告中不足之处，这是很好的，如周恩来提出在防御问题上要“主动”，这“主动”两字很好。他建议在决议中将周恩来所主张的“主动”两字加上去。

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军事路线问题，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当时有过多种意见。有的主张，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在结论中还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他说：一切服从战争，不是问题的问题。但由老百姓变为红军，必须学习。军事理论大门是容易打开的。应熟悉十几条军事原则，加上本身作战经验，就会提高军事水平，这在战争环境中是很重要的。

会议当天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的基本内容与毛泽东的军事报告是相同的。毛泽东的军事报告和这个决

议，是中国共产党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重要文献。

25 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就此结束。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为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时指明了前进方向。从此，红军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军事战争方针，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进行了一系列的作战和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 27 日应邀到中央党校给党的活动分子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对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又作了一次全面深刻的阐述。

第二节　东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一次军事实践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即着手准备红军东征。东征战役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红军进行的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一次重大的军事实践。

一、东征战役之前的奠基礼

1935 年 11 月 21 日至 24 日，红军发起的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亲自指挥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苏区时，正碰上国民党“西北剿总”向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军以 5 个师首先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今富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尔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步向北压缩的方针,企

图将红军消灭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毛泽东根据这一敌情，准备打一漂亮仗，为红军立足西北打下基础。1935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要他们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和以南地区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芦河能否徒步等情况。第二天，毛泽东亲往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等，共同商定直罗镇战役计划，确定先攻克张村驿。毛泽东还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词语，说明开辟革命根据地同发展红军的密切关系。9日，红十五军团攻克张村驿，毛泽东即电徐海东等，要他们注意发动群众斗争，分配土地，建立政权。

18日，毛泽东在张村驿召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所以红军的战略应是攻势防御。根据攻势防御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直罗镇战役的具体办法：是准备红军主力集中南城，出中部（今黄陵）、洛川、切断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攻占甘泉、延安。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除了上述部署外，为了打好直罗镇战役，还专门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详细讲解了红军这次战役的部署和任务。他还用《水浒传》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说明这次战役的具体打法。他说 林冲在柴进家打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免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我们现在的打法，也是如此。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他强调这次战役一定要打歼灭战。

19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张村驿西端的川口子。当天，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说，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直罗镇战役前，毛泽东还同彭德怀、周恩来带领红一、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前往直

罗镇西南面的一个小山头查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几十架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周围的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鄜县大道上的一个较大的集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南北群山连绵，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大部队展开比较困难，但三面环山,地形象个口袋,是歼灭敌人的好地方。20 日,敌第一〇九师进至直罗镇，红军当夜将其包围。21 日，毛泽东在北山关家台北端高地设指挥所,亲自到前线指挥红一、红十五军团作战,提出这一仗“要的是歼灭战”。拂晓,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展开猛烈攻击,激战至下午 2 时,歼敌大部。此时,敌军援兵分两路迫近直罗镇。毛泽东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各个击破敌军。23 日他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当日，红军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援敌一〇六师的一个团。24 日，直罗镇之残敌在突围中被全歼，直罗镇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锋，俘敌 5300 余人,缴枪 3500 余枝。

直罗镇战役是奠基西北的关键一仗，在整个战役中，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与彭德怀分工，他随红一军团行动，彭德怀随红十五军团行动。毛泽东深知指挥员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重要性。他在读《三国志》一书时,在失街亭一节,写批注道“:观人观大节,略小故。亮初战,宜亲临街亭。至败,后战亮必在军中。”他认为失街亭主要责任在诸葛亮,而不是在马谡,这样重要的战役，诸葛亮作为统帅应该亲自前往指挥。后来失败了，所以诸葛亮汲取了教训，以后碰到这样重要的战役诸葛亮必在前线亲自指挥。毛泽东认为，看人主要看大的方面，略去小的错误。他赞扬诸葛亮知错就改的“不二过”的积极态度,所以觉得诸葛亮还是不错的,大家还是很喜欢他。

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部队召开祝捷大会。11 月 30 日毛泽东出席在东村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作《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四条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